



我在石库门弄堂长大。没有空调的夜晚，人们酷暑难忍，就会提着水桶去弄堂深处的水井打上几桶水。井水很凉，不仅能浸凉西瓜，把它泼向空地，还能浇去一片余热。

“冲凉”后的弄堂会聚起一群摇扇纳凉的人群，谈天说地，下棋打牌，邻里之间，其乐融融……

天一热，人又多，小弄堂挤不下了，纳凉人群就会向马路延伸，塞满了大街小巷。四十年前的上海，家家没有空调，就连电扇也算奢侈，人们在弄堂内、马路上纳凉是一种生活习惯，可谓满目皆是。有的家庭人多拥挤，还会把晚饭搬到外面来吃，邻居们也会借此评点一番，看到有好吃的，还会蹭上一口，引起一片欢笑……

弄堂口的过街楼有穿堂风，电杆下有昏黄的路灯照亮，这些地方往往成为乘凉“宝地”。但近水楼台先得月，住在弄堂底的我只有羡慕的份。



吐峪沟农家 (油画) 卓然木·雅森

单位门口新开了条社区巴士线路，弥补了周边市民出行最后一公里的困扰，方便了许多出行的市民。

或许人们不知道，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申城就有了首条社区巴士——公交97路。当年为了缓解虹口区北部地区市民出行困难，公交部门开设了仅有8站路的社区巴士。半个世纪过去，这条社区巴士依然在运行。

当时的公交97路是运营线路最短的公交车，但由于途经的线路都是居民住宅区，且是当时市郊江湾镇居民出行通往市区的唯一公交车，因而非常拥挤。

当年我住在广中路中山北路附近，对97路公交车有很深的印象。那些年住在97路公交车周边的市民，除了出行上班和去四川北路商业街逛街外，休息天去江湾电影院看电影、去江湾镇买菜也会坐这条社区巴士。

去江湾镇买菜，倒不是因为家附近没有菜场，而是因为当年江湾镇是郊区，农民们每天收割上来的新鲜蔬菜都会到镇上来卖，价格不但便宜，而且还不限量（当年菜场买菜，排一个队只能买两种蔬菜且有分量限制）。所以有些住在市区的市民，也会在休息天一早提着两只竹篮，赶头班车到江湾镇买菜。

那年我还在上中学，星期天为了让自己辛苦了一周的父母多睡会儿，“自作主张”地“偷偷”起床，匆匆出门赶97路公交车，帮父母去买菜。见车子来了，便急忙上了车。那时，公交车不像现在无人售票，售票员见我上车让我买票，

有个夜晚，酷热难当，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先洗了把冷水澡，又拿竹榻在弄堂伴着月光睡了一宿。后来，有人告诉我，弄堂更佳纳凉处，是在屋顶上。我也带着凉席，爬上红色瓦片铺就的斜屋顶。夜空吹来了一阵阵风，没有任何阻挡，那种凉爽是弄堂人家难以享受的，那种空旷更是城市孩子很少见到的。人在屋顶，望着浩瀚无比的星空，望着穿行在云朵里时亮时暗的月色，这感觉真是好极了。但人在高高的斜屋顶上，一旦发困睡着会有危险。

渐渐地，我在屋顶上发现了个绝对安全处，那就是老虎窗与屋脊之间有道沟。睡在其中，稳若磐石。只是人不能出声，若与好友相伴更要闭上嘴，只怕惊动了老虎窗下的人家。窗内就是石库门中的三层阁，它与亭子间一样，都属石库门中居住条件最差的。我家住石库门西厢房，却躲在人家老虎窗上

纳凉，难免会有点负疚感，后来便不去了。

弄堂纳凉最经典的记忆是给居民们看电视。夕阳未落，居民们就早早地带着小板凳来等候观看了。当时我母亲是居委会干部，那台黑白小电视机由我家保管，我家三兄弟也拥有了开启电视机的小小“权力”。夜幕降临了，每当我们旋动电视机开关，底下黑压压人群一片欢腾，就像过节一样。《姿三四郎》《大西洋底的人》等译制片，都是在那个电视尚未普及的年代集体观看的，根本不像今天许多人与电视机渐行渐远了。

当暑热把成千上万的人群赶上街头之时，申城随处可见的百万“乘凉大军”蔚为壮观。此时，各种纳凉晚会纷纷涌现。文艺演出兵分数路，献歌献舞，送戏上街。演出因陋就简，利用乒乓球台、菜场长桌、卡车平板、沿街

我摸摸口袋，不好，居然没带钱，这下我开始慌了。还没争辩，售票员就认定我是“逃票”，任我怎么解释，售票员都不“放过”我，还把我带到了终点站，有车队人员像“押”犯人似的把我“押”到家里，交给父母，并严厉地教训了我一顿，说下次再犯会怎么样，吓得我父母忙赔礼道歉，并补上五分钱车费。

为了尽可能将事情不扩散，在左邻右舍们还没起床的情况下，父母亲把车队人员和我拉到厨房里，小声严厉批评我，下不为例。我哆嗦着频频给那位公交车队的人鞠躬致歉，来人才一边教训我父母，一边离开了我家。

那天一家人因为此事，非但没有吃到新鲜的蔬菜，还闷闷不乐了一整天。父母亲生怕公交车队的人把这件事告诉我就读的学校，担惊受怕了一个多星期，直到多日后，见学校和周边街坊邻居没有“动静”，才如释重负。

原本想给父母减轻点负担，不料却给父母亲增添了麻烦，我心里从此有了“阴影”，再也不敢“自作主张”地去买菜了，也不敢坐家门口的这条社区巴士了。后来，有次父亲让我和他一起去江湾镇买菜，我说，我们还是徒步走去吧！

如今，这一路段的农田早已消失，新建了许多住宅小区，交通出行条件也大为改善，虽然97路公交车经过两次延伸，江湾镇站延伸到了轨道交通三号线江湾镇站附近，但依然“肩负”着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社区巴士角色，迎来送往广大乘客。

舞蹈家黄豆豆给我打来电话，声音里有些茫然，说他怎么忽然就到了不惑之年了呢，甚至一下都想不起这段日子是怎么走过来的。我听后，想到当年自己四十初度的时候，也是像梦游一般恍恍惚惚的，而且，甚至到今天似乎还远远达不到不惑的境界，常常会生出许多的疑惑来。

记得黄豆豆还不到二十岁时，我去采访他，时间安排在开演之前。那天上午，他在家练习时不慎崴了脚，结果他父亲忧心忡忡了一整天。我在剧场后台采访时，黄豆豆一边化妆，他父亲在一边帮他涂敷药膏，轻揉细按。我有些不解，心想黄豆豆自己倒是觉得没多大关系，他父亲是不是过于紧张了？有人跟我说，黄豆豆的父亲很喜欢跳舞，但时运不济，抱负得不到施展，所以，将自己未能实现的夙愿寄托在儿子身上。我父亲同样富有文艺细胞，同样在那个年代难以施展才能，当看到我喜爱文艺的时候，他总是竭力地呵护我、帮助我，所以我很愿意将自己的理想“转嫁”给我，而我会努力地不辜负他的期望。我相信，事实上，做父母的更能感知自己孩子的天赋，而且如果真的与自己的爱好相近，还更有针对性地、更有效地增进孩子的才华。

没有人比黄豆豆更加理解自己的父亲了，尤其是在他父亲去世之后。黄豆豆给我打来那个有些茫然的电话后不几天，我便收到

高地等搭建舞台。高高树杈上悬挂起扩音喇叭和“小太阳”，这是当年最好的音响和照明设备了。演出开始，成百上千的男女老少欢聚而来，伸长脖子，踮起脚尖，站上板凳，爬上树梢，竞相观看，难熬的酷热就在欢歌笑语中渐渐淡忘……

淮海西路上有幢文明珠，当年居住着许多文艺名家，这里纳凉晚会就更热闹，谁住得最高谁先演，这自然由家住十二层的京剧名家童祥苓首先亮相。随后，俞振飞、尹桂芳、刘斌昆、李炳淑、李蔷华、张南云、茅惠芳等大师名家以及歌唱家施鸿鄂、朱逢博夫妇等相继登台，这是我所见过的阵容最强的上海社区纳凉晚会。

如今，乘凉大军在申城早已不见，纳凉晚会也恍若隔世。这消失的背后，其实折射出了上海改革开放以来城市的巨大变化。

他将在今年上海书展上推出的《黄豆豆赏舞课堂》，除了四张DVD，还有他的随笔集《舞者随笔》。就在这本书里，我第一次看到了那些黑白照片，上面留下了黄豆豆父亲优美的舞姿，他虽然是温州一家工厂的职工，但他和厂里爱好文艺的工友们，创作排演了不少舞蹈剧目，声名在外。黄豆豆写道：“自从我踏上工作岗位那天起，为了能让我更好地训练，更好地舞蹈，父亲来到了他的出生地——上

## 不惑的舞者

简平

海，为我挑起了所有生活的重担。整整九年的时间，父亲默默付出，毫无怨言。终于有一天，不经意间，我突然发现白发已悄悄地爬上父亲的鬓角。可每当看到我和演员们在练功房里排练、在舞台上演出，他的眉宇间就会流露出幸福与欣慰之情。是的，父亲从来就是热爱舞蹈的，他将舞蹈视为自己最高的事业与梦想。”在黄豆豆的眼中，他的父亲是一个真正的舞者，而他对于自己的照顾，与其说是成就孩子的事业，不如确切地说，他是艺术的“传播者”和“保护神”。

我读着黄豆豆的随笔，忽然发现他的“茫然”或许来自于他对孩子的歉疚，他跟我说，

我国被称为“鸡鸣三省”的村镇大约数以百计，雄鸡打鸣，三个省的人民都能听到。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鸡鸣三省”的地方情有独钟，中国的红色政权当时往往选择在数省交界的地方，例如著名的湘鄂赣根据地、鄂豫皖根据地、湘鄂西根据地等。

最近赴吉林到了一个位置非常奇特的村子——防川。打开吉林省地图，其图们江入海处是一个尖尖细细的长条，防川村就在这尖尖细细的长条的顶端，隶属珲春敬信镇。防川的一侧是俄罗斯，一侧是朝鲜，防川被夹在俄罗斯和朝鲜之间，有“鸡鸣闻三国，犬吠惊三疆”之称。防川距俄罗斯远东最大的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159公里，距朝鲜罗津33公里，图们江的出海口是日本海。

距防川数公里是著名的张鼓峰事件发生地。1938年张鼓峰事件发生后，苏联将其控制区一直推进到图们江边，仅留一条由中国内地通往防川的小道，称为洋馆坪。1957年，图们江水暴涨，洋馆坪小路被冲断，防川成为一块“飞地”。此后20多年，中国人要到防川，不得不向俄罗斯和朝鲜借道。直到1983年，长880米、宽8米的洋馆坪路堤修建完工，我们才有了属于中国自己的一条道。

洋馆坪路堤系以青石建筑，其左侧是俄罗斯地界，其右侧是中朝两国的

他的大女儿都上小学了，小儿子现在也走路利索，说话顺溜，可他觉得由于忙于工作，所以在持家育儿方面的家庭责任担当是很有限的。我想，如果他以自己的父亲作参照的话，内心确实会因此而生出不少感叹的。好在黄豆豆是个有着极强领悟力的人，他在随笔里写到一次在长途飞机上的睡梦中出现了这样一个超现实场景：很多很多年之后，已是白发苍苍的自己即将与这个世界道别，突然，身后一个似曾熟悉的声音叫住了他，顺着声音缓缓回头，一眼望去，竟遇到了那个年幼的、还未曾习舞的、幼儿园编号为215的自己。他问他，还有最后一分钟，你此刻最想听到谁对你说话？他想到了同事、同行和观众，想听到他们对他舞蹈事业的肯定。但是，最终他选择的是希望听到自己的家人对他说：“你是一个合格的男人。”

我觉得，一个在舞台上谢幕后便深深地融于温情的家庭生活的人，一个对自己的孩子怀有深厚的责任感并愿意扶持他们展开理想翅膀的人，才是一个不惑的舞者，黄豆豆能够作出这样的选择，那他真是明辨不疑的四十之人了。他叮嘱我说，你也要多多地跟家人在一起，我说那是当然的，因为我也喜爱艺术的孩子，因为我也作为榜样的父亲。

界河图们江，均只有数米之遥，被誉为“天下第一堤”。在洋馆坪路堤上，常常可以看到俄罗斯巡逻的哨兵，听到他们讲话的声音。以图们江中心为界，一侧为中国，一侧为朝鲜，渔民可以在图们江自由捕鱼，只要不登上对岸，就不算过界。这段宽8米的由内地通往防川的通道是我国最狭窄的一段国土。

防川现在仅有30多户居民，多为朝鲜族。屹立在防川洋馆坪路堤尽头的是一座高达7层楼的边疆哨所。哨所的墙上悬挂着8个红彤彤的大字：“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登上哨所顶楼，通过高倍望远镜，可以看到波涛汹涌的日本海。俄罗斯方向可以清晰地看到茂密的森林、湖泊、山丘和铁路，朝鲜方向可以看到长满庄稼的田野和缭绕的炊烟。

在哨所的军事区内，有一座古老的“土字碑”，这是1886年中俄重新勘分珲春东部边界时竖立的，距今100多年，属于国家一级文物。“土字碑”高144厘米，花岗岩质地，上书“土字碑”3个大字及“光绪十二年四月立”8个小字。“土字碑”背面刻有俄文字母“T”字。中国“土字碑”距离图们江出海口只有8公里，“土字碑”曾经是中俄边界的起点，但今天已不再担负界碑的重任。在“土字碑”的边上重新竖立了一块标有“422”的新界碑，这是中俄两国现在的界碑。

## 鸡鸣闻三国

华强



我的老家在大山深处——云南省大理州宾川县平川镇东升村，这是一个距镇上一个多小时车程的小山村。

我读书时课外书籍奇缺，除了看些“小人书”外，印象中看过的“大书”也就是《平原枪声》《岳飞传》《左传》那么有限的几本。印象深刻的是和母亲徒步翻山越岭到平川镇做客时，父亲慷慨给了五元零花钱，我就买了本侦探小说，回家还得到父亲的夸奖，心里乐滋滋的。

我中师毕业参加工作后，就荒废了小时候爱好的阅读。某天忽然发觉自己的“池塘水”不够给学生“一桶水”了，便又拾起书本，去书里寻觅“源头活水”。如今想来，荒废了读书的那些时日，真是糟糕！

幸好推广阅读的基金会如同一股春风来到大理宾川，已经做了多年班主任的我好生激动！在校长的支持下，便在班上不遗余力地开展起“共同阅读”。

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有点残酷。班上几个“刺头”学生曾让我回家翻找心理学、教育学书籍，同是教师的媳妇一脸狐疑地问：“是不是学生难管？”“好管我翻书干

嘛？”就是这样的班级，让我边教边从书籍宝库里寻踪，分析原因，摸索如何走近他们的内心世界，尝试着丰富课堂：从此，语文课会飘出一阵阵歌声，毛笔进了我教室，球场上有我们师生飙球的身影，树荫下会传出全班品茗聊天的欢笑，盛夏早上的第一节语

## 阅读带来的“奇妙”

徐家运

文课变成了体育课，翠绿养眼的小树也现身教室，全班阅读竞赛持续进行，每学期学生评语我逐一手写，假期也让他们阅读和锻炼，老师结婚时让他们写贺信，老师离别时写信谢师恩……两年过去，我很想知道阅读这事儿对学生到底有没有影响，就做了次小调查：“同学们爱看哪方面的书呀？哪个作者的？”

“爱看英雄人物传记”，“我就喜欢感人的亲情故事”“我喜欢儿童文学”……

中、城中就读。引得“美丽中国”项目老师邓静茵夸赞他们是“变化和进步明显的一个班”。曾经的“刺头”，现在相逢还能跑过来问好。

是他们逼着我翻阅书籍，是阅读书籍让我改变了他们。

这一切让我坚信：坚持鼓励学生阅读，没错！

2017年，我主动请缨回到家乡学校东升完小执教。

2018年，也因为我对阅读推广的坚持，所以颇感意外地获得益善基金会组织的到上海复旦大学培训的机会。无巧不成书的是遇到了学生和我喜爱的儿童文学作家！到复旦培训还有个感触：我们被称之为益善的“合作伙伴”。这句话我感受到他们对于推广阅读的真诚……

因为阅读，大山深处的我长了见识；因为阅读，让我真实感受到人生的奇妙！我将努力让阅读这盏灯，照亮山乡孩童前行，让他们领略世界的美妙！

## 十日谈

公益路上的书香

责编：殷健灵

通过阅读，孩子们学会了尊重、关爱、宽容，有了自信心。